

诸子“务为治”与《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

杨 汉 民

(衡阳师范学院 人文社科系,湖南 衡阳 421008)

[摘 要] 《吕氏春秋》杂而成家不仅在于兼容并蓄,而且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即以政治理论为主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先秦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深刻指出了其中“知人”、“为治”的参政目的。正因为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才促进了《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同时该书杂而成家及突出的政治理论思想,也正是诸子各家因“务为治”而融通发展的集中表现。

[关键词] 诸子; 务为治; 《吕氏春秋》; 杂家特色

[中图分类号] B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1-0058-03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杂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书·艺文志》曾指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其所长也。”在班固看来,杂家和议官是相通的,相对道、儒、墨、法等各家而言,杂家即在于批判吸收当时各派思想,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可谓先秦诸子中一个独立的学派。杂家的特点即在于通众家之意,兼百家之长,以达到“王治”的政治目标,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吕思勉说“所谓议官,则喷室之类也。”^[1]谓喷室,是指正直人士批评君主过失,剖析是非的场所。刘元彦认为,《吕氏春秋》在思想文化上综合先秦诸子百家是比较明显的,政治上则在于制定统一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略,可谓兼容并蓄的杂家。洪家义在《吕不韦传》中也指出,《吕氏春秋》扬弃诸子学说,其内容都是围绕政治这个主体而展开的,可谓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可见,《吕氏春秋》杂而成家不仅在于兼容并蓄,而且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即以政治理论为主旨。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对各思想流派进行了评价并明确指出“务为治”是诸子百家争鸣的共同目的。其实正是因为诸子各家皆“务为治”才促进了《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同时该书杂而成家及突出的政治理论思想,也正是诸子各家因“务为治”而融通发展的集中表现。

一 诸子因“务为治”而融通发展与杂家《吕氏春秋》的兼容并蓄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纷争,导致“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局面。这种多元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存在,使得当时各家各派学说都能够有机会纷纷登场,从改

变社会现实出发,竞相提出自己的救世纲领和政治主张,从而获取当权统治者的认可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诸子百家相互争鸣,誉称我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到西汉时司马谈对先秦及延续到当时的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总结诸子各家皆“务为治”,就是说诸子百家不管如何争鸣,言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务为治”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而提出了各种学说,亦即在“究天人之际”的普遍模式中把“知人”、“为治”作为中心和宗旨,以关注和参与政治为目的。而恰恰正是由于这种“务为治”的共同目的,使得各家各派在相互批判中得以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进而融通发展。

众所周知,从儒家孔、孟、荀的列国游说,到法家商、韩的变革图强,从道家老、庄的自然无为,再到墨家的兼爱互利以及纵横家苏秦、张仪的历史事迹记载等等,诸子各派无不致力于社会政治的考察与论说。这种政治参与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反面,但都正如司马谈所深刻指出的,皆“务为治者也”。《荀子·解蔽》篇记载“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在这种形势下,百家争鸣必然愈演愈烈,诸子互进进而此消彼长就在所难免了。政治上的你争我夺势必带来学术思想上的相互攻讦。为了证明自己学说的合理性和社会价值,诸子各派往往努力争取政治上的参与和支持,一方面可以依附政权而将理论价值得以实践,另一方面则可以诋难和消除异己。然而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群雄割据和战乱的年代,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权的更替,不同的统治阶层从现实需要出发,又往往可能选择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加上区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士人群体的壮大和流动,诸子各派必然总还有适宜自己生长的土壤和条件。进一步说,尽管百家争鸣相互批判,但其实各家又都有着同样的

[收稿日期] 2010-12-30

[作者简介] 杨汉民(1972-),男,湖南祁阳人,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都是“务为治”的。各家学说的区别仅仅体现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上,都是有其长处,又都有其短处的,只看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况下加以应用而已。正如《庄子·天下篇》所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汉书·艺文志》也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由此可知,从客观环境影响到主观生存需求,诸子百家在相互争鸣的过程中,因为“务为治”的共同目的而取长补短乃至融通发展了。同时诸子各家因“务为治”而融通发展的这种趋势,自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战国晚期《吕氏春秋》杂家特色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可谓群星灿烂、盛况空前。而到了战国晚期,政治统一已成大势所趋,从“务为治”目的出发,诸子百家之间的影响及融合也就日趋明显,此时如何实现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便渐渐进入了总结阶段。儒家大师荀子在维护孔子基本观点的同时对当时各家思想都有批判的吸收,成为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肯定各家学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也各有所“蔽”,标志着战国思想大融合的开始。法家韩非曾师事荀子,他发挥了荀子的性恶论和老子的辩证法,把前期法家“法”、“术”、“势”的思想结合起来,并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对儒、墨、道等都进行了批判吸收,完成法家理论的系统化而成为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人物。荀子和韩非的总结虽然看到了各学派之间在“务为治”这一问题上的联系和价值,然而却都是从本学派立场出发来批判和吸收其他学说,明显存在着学术偏见。而真正完全打破门派、平等对待诸子百家“务为治”的观点、对各家学术思想进行客观总结并全面继承的,则只有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集体编纂的《吕氏春秋》。该书内容丰富,“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2] 卷85,1696,视为诸子百家融合的重要标志,也是最有特征的“杂家”著作。如《吕氏春秋·不二》篇言“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已,孙臧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明确指出诸学派各有所长。《用众》篇言“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善学者假人之长,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众之白也。”提倡百家九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具体内容编排上,《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根本建构起一个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系统,广泛吸收阴阳、道、儒、墨、法、名、兵家等各学派观点,并对诸子各家的治国思想加以综合而又有所新的创造,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以“德治”为主的逻辑体系,拟为即将到来的政治统一制定方略。“它的结构体系及其观点、方法等,支配中国人思维方式达二千年之久。”^[3] 因此《吕氏春秋》杂而成家和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正是先秦诸子因

“务为治”而融通发展的完好表现。同时该书作为先秦最后一部集大成的理论巨著和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终结的重要标志,已成为近些年来很多学者的共识。

二 诸子“务为治”与杂家《吕氏春秋》编著的政治理论目的

吕不韦集众著书的目的就是要构造一个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以便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提供较为完备的理论学说和治国方案。《吕氏春秋·不二》篇指出“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之也。”该书所要做的,就是试图使“万不同”的百家学说归于“一穴”,以便“足成”一种“圣人”的理想制度。这是战国时期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反映。走上统一发展趋势,必然需要一种融通百家的统一理论。《吕氏春秋》能够以其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客观公正的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和总结,并体现出为大一统政治服务的成书目的,除了吕不韦所处时势及个人作用外,诸子“务为治”的共同目的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战国末年秦国的强大和统一趋势的明显,以及秦招贤纳士的开放政策和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各派士人纷纷投奔于秦,为实现王政各抒己见,逐步形成了以秦相吕不韦为首的学术交流中心。诸子之学“务为治”的共同目的在秦及吕不韦的主导之下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挥,较完整地体现于“杂家”《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之中。

众所周知,在战国时期,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量涌现与活跃。一方面正如孔子所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4],“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饱学之士流散民间和私人办学不断兴起,文化知识也随之传播到社会普通民众层面,有学问或一技之长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代表诸家学说的各派士人。另一方面,战国时期各诸侯、大夫及贵族为了增强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或争霸天下,十分需要借助诸子之学及士人的力量,因而“养士”之风盛行。文化的传播扩散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为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交流和互动提供了必备的基础,士人的地位也得到了亘古未有的重视。《荀子·致士》篇载“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表明政治只有得到士人话语实践的支持才能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否则其权威性就会自动坍塌,即如《荀子·王霸》篇所言“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而诸子之学也正是由于“务为治”的各种思想主张才可能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可见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和促进是不容置疑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百家争鸣同时又标志着文化的繁荣和士人的崛起。士人的成分虽然复杂,但他们都可以“务为治”的能力和贡献得到重用。战国时代统治者上层争相礼贤下士,使得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孔丛子·居卫》记载“天下诸侯方俗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这就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

发展和流动。同时各诸侯国纷纷采取宽容的学术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某些士人著书立说,发表个人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的特定政治文化背景,决定了百家争鸣的直接目的和中心话题即正如司马谈所说的“务为治”,即如何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齐国稷下学宫曾是战国时期闻名的学术中心,诸子百家的集聚地。齐威王、宣王时招徕天下文人学士数百千人,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不治而议论”^{[2] 卷46,1054},即不居官位然积极探讨社会时政及人事,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虽然是时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士人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蓄,都给予礼遇。先秦不少著名的学者都曾活动于稷下学宫,如孟子、荀子、邹衍、淳于越、宋钲、尹文等,其中包括儒、道、法、阴阳、兵、名等多家。各家在争鸣中相互影响并曾有《管子》一书的产生。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虽然内容繁杂,但其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和“务为治”的政治目的也是不可否定的,可谓“最早的一部杂家著作”^{[5] 203}。诸子百家虽然各自主张未必一致,甚至像水火一样不相容,但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这不仅在稷下学宫,在战国诸子百家的整个学术发展过程中也往往需要互相补充,从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得以提高以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越到后期表现就更为明显。各派士人“著书立说往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5] 203},皆“务为治者也”。从《荀子》、《韩非子》、《管子》、再到《吕氏春秋》,虽然各自所处立场未必相同,但其目的都在于总结诸子百家和为实现大一统的“王道”政治服务。尽管齐稷下学宫曾经学者云集,齐与秦也曾并称东、西二帝,但到齐湣王时已走向萧条,统治者的排斥、暴政或国家动乱使诸派士人难以为继,不得不另寻出路。而此时的秦国因“驳而霸”^{[6] 304},兵强国富,统一天下的实力愈见明显,同时又有着广纳天下人才的传统,战国晚期士人的价值观由此不能不发生转变了。历史上曾有孔子西行不到秦之说,但荀子深入秦国考察后言其“古之吏”、“古之民”、“古之士大夫”和“古之朝”^{[6] 303},不由发出“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6] 303}的感叹,对秦之地理形胜、政风民情和国家强盛极力称赞。虽然荀子对秦的“无儒”还不够满意,但概

括其“驳而霸”的政治特征则足以说明秦是兼容并蓄,深受东方六国文化影响的,而且事实上荀子入秦之后也还有好些儒家弟子留在了秦国。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方六国曾以“戎狄”或“虎狼”喻秦的种种看法。考虑天下大势和比较齐、秦两国情况,士人价值观发生转变则在情理之中。相比东方六国的衰落,秦国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富庶和军事上的强大胜利,吸引了六国各派学者。他们希望投身明主以安身立命和实现自己的抱负,强秦应该是最好的去处。适时正逢吕不韦入秦为相,“亦招致士,厚遇之”,于是“至食客三千人”^{[2] 卷85,1696},昔日的稷下学者也有很多成为了吕不韦的门下。诸子“务为治”的师道传统和共同目的,促使各派士人不断地阐发和提供种种“治道”主张、而且以入仕参政为天经地义之事。吕不韦早年经商又曾奔走于各诸侯国,知道士人的价值也深受稷下之学的影响,在招徕大量士人后能仕者则仕之,不宜仕者则使之编书。而投身入秦的各派士人亦为实现王政献计献策,各抒己见,从而有了《吕氏春秋》的百家融合和政治理论主旨。由此观之,诸子“务为治”的共同目的导致了战国晚期士人价值观的改变,同时也成为《吕氏春秋》编撰成书及突出之政论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亦正是稷下之学兼容并蓄和“务为治”思想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吕思勉. 先秦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478.
- [2]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3] 孙以楷, 刘慕方. 《吕氏春秋》——先秦诸子的集大成 [J]. 学术界, 1992(6): 25-28.
- [4]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389.
- [5] 孙开泰. 先秦诸子精神 [M]. 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
- [6] 王先谦. 荀子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7] 刘元彦. 《吕氏春秋》: 兼容并蓄的杂家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 [8] 洪家义. 吕不韦传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The Scholars' "Serving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Lü's Spring and Autumn's Eclectic Characteristics

YANG Han-min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Lü's Spring and Autumn is eclectics because it is not only compatible, but also has systematic thought that political theories are considered the main purpose. Sima Tan's 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Six Schools indicated deeply the purpos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bout "understanding people" and "serving politics". Only because of "Serving politics" of all schools, the eclectic characteristics of Lü's Spring and Autumn could be formed.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that is considered eclectics and has prominent political theories is just the concentrated performance of all schools' "serving politics" and compati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cholars; serving politics; Lü's Spring and Autumn; eclectic characteristics